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英美民族学

苏联 托尔斯托夫等著



民族出版社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НА СЛУЖБ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譯出

目 錄

一、資產階級民族学的危机 С·П·托尔斯托夫	3
二、美國民族学中的世界主义 И·И·波切兴	26
三、为英帝國主义服务的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 Д·А·奧利迭罗格, И·И·波切兴	64
四、英美种族主义 М·Г·列文, Я·Я·罗金斯基, Н·Н· 切波克薩罗夫	103
五、美國民族学中的心理种族主义 Н·А·布齐諾夫	143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英美民族学

苏联 托尔斯托夫等著

民族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番号: 1408 (1) 064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英美民族学

苏联 托尔斯托夫等著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問題譯叢編譯室譯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國子監街 5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47 号

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1953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1958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137 千字 印張 5 $\frac{1}{2}$

印數: 1—1,900 冊 定价: 三角八分

統一書号: 3049 · 41

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危機

(一)

近年來，在國外民族學著作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引人注意的特點，這些特點表明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特別是在戰後時期已處於嚴重的衰退過程之中。

這首先表現在民族學論壇的中心發生了大轉移。歐洲大陸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巨大領導中心，差不多已退出了舞台，最低限度也是完全喪失了自己的領導地位。

各種各樣的美國民族學著作，大量充斥於整個歐洲和亞洲，其中有為數眾多的民族學雜誌，有的是舊有的，有的是新出的（現在在美國差不多每一個大學都在出版這樣的雜誌）；也有許多研究世界各族的大本專著；有許多理論性綜合性的“解決一切民族學問題、順便也‘解決’一般歷史問題的大部頭‘著述’”，大批的民族學家的論文，也開始出現在美國近來迅速滋生的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和一般性的雜誌上。此外，在這方面還有形形色色的教科書和教材。

而且，有許多西歐的民族學家也慢慢地變成了“美國人”。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了英國功能學派首腦馬凌諾斯基的遺著“文化變遷之動力”（1945年）；美國還出版了施米特神甫的美國學生季伯爾和繆勒合寫的“原始人的社會生活”（1941年）。

美國的民族學書刊充斥於歐洲馬歇爾化各國的圖書館和書店，正象以“綁架”和凶殺為題材的美國偵探小說、以及不遜於這些小說的好萊塢電影、爛肉罐頭、舊衣服和蛋粉充斥於這些國家一樣。

美國的民族學著作，不僅數量增多了，而且在質量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應當說，這些“質的變化”早在戰前時期就已清楚地顯露出來了。

過去，美國民族學主要是記述和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帶有十分明顯的地方志的性質；現在，代之而起的民族學，則很少注意印第安人（只限於南美），而加強了對非洲、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歐亞各國的興趣，多半都帶有理論化的性質，追求“廣泛的概括”，追求“全世界歷史性的綜合”^①。

研究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的“可敬的”學者克婁伯，他用“文化生長的聖貌”這個含糊不清的標題出版了一大本書，在書中，他引用了從古到今各種科學、文學和藝術歷史的材料，企圖確立文化上興衰的“神秘旋律”^②。研究“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女學者路絲·別涅迪克特，也寫出了一本大著，標題是“文化模式”^③。不大著名的車普爾和孔恩，則合寫了一本“人類學原理”^④。研究非洲的學者格爾什科維茨寫了一篇論文“人類及其勞動”。此外，寫過類似作品的，還有克留克霍恩、米德、林頓、卡

① 參看 H·A·布齊諾夫：“現代美國理論民族學”，載“蘇聯民族學”雜誌，1949 年第 1 期，第 213 頁。

② 參看 H·A·布齊諾夫的書評，載“蘇聯民族學”雜誌，1948 年第 2 期，第 251 頁。

③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的書評，1949 年第 1 期，第 214 頁。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1947 年第 4 期中的批著。

④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的書評，1948 年第 2 期，第 248 頁。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 1947 年第 4 期中的批著。

尔迪涅尔^①以及其他等人。

这是象雨后春笋一样滋生起来的“理论化类型”的美国民族学产品的空前大丰收，这些著作中不负责任和毫无根据的现象，甚至对资产阶级著作来说，也达到了特别令人惊讶的程度。不由人不产生一种印象：好象作者们是接受了这样一项任务——尽量多写，不拘题目，不求质量，不要考虑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有人相信，只要让新的世界霸权追逐者的宣传读物能充斥于美国和世界书市就行，就象好莱坞老板和侦探小说出版商所做的那样。因为，这些影片小说无疑地也跟刚才我们列举的美国“文化”宣传的杰作一样，全都是华尔街走狗们的宣传臆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广泛展开思想进攻的一切征兆。民族学本身也跟德国种族主义作品中的人类学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烟幕、一种伪装，除了广告式的宣传外，还要使读者相信它不是普通一般的东西，而是“高度科学”的作品。

至于这些“著作”中所附的图表是根据哪些材料以及是如何编成的，——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图表需要多，因为在学者的著作中是应当这样的。至于这些著作中所引用的是些什么文献以及它们与其宣传的思想有些什么关系，——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在每本书末要附上长长的参考书目，因为在学者的著作中是应当这样的。至于科学批评很容易剥去这一层外壳而暴露出这些“学者著作”的丑恶实质，那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只要遵循一些老原则：“数量多些，价钱贱些”，“胡扯胡扯，总会留下些东西”，也就可以不去理会批评。要知道，批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批评到的；而且在已被揭穿的“著作”的地方，又已出现了按宣传轨道运行的新“著作”。即或是它被揭穿了，它也能

① 参看“苏联民族学”杂志的书评，1948年第3期，第186页。

在無耻的勾当中起一点点作用，成为今日帝國主义侵略思想——种族主义——麻痺讀者意識的可怕毒素。因为，華尔街的走狗們，也正象希特勒的文墨强盜一样，是打着这种仇視人类的思想旗帜出現的，这种思想有时被飾之以新的“心理种族主义”的色彩，有时則赤裸裸的一点也不加掩飾。

“希特勒开始其發動战争的事業，是从宣布种族理論，宣布只有操德語的人才算是优秀民族开始的。邱吉尔先生开始其發動战争的事業，也是从种族理論开始，断言只有操英語的民族才是优秀的而应主宰世界命运的民族”（斯大林語）^①。

（二）

在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資產階級民族学發展中的主要傾向，还是尖銳地反对揭示社会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伪歷史主义、黎克特的所謂“歷史主义”。到了四十——五十年代，則一眼就可以看出完全对立的傾向——強烈的反歷史主义。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学中兩個势力最大的学派：英國的“功能学派”（現在在美國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美國的所謂“心理学派”，正是在自己的身上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這兩個学派都是忠心不二地服務於帝國主义的。英國功能学派的美國追隨者和繼承者車普尔和孔恩，他們这样地肯定了功能学派之父馬凌諾斯基及其同道者的“成就”：“……約在二十年以前，（民族学的狀況）發生了变化，这时，許多权威人士开始認識到：民族学可以被殖民行政当局用之於調整白人和‘原始’民族之关系的特別領域。不列顛政府首先作了这个發現，並在實踐上加以运用，而且定了一个規章：凡是在土著民族中間工作的殖民官吏都应当成为熟練的民

① 1946年3月14日“真理報”。

族学家。按这一规定，有许多人能够受到布朗尼斯罗·馬凌諾斯基教授的培养，这無論对政府或对土人(!)，都是極其幸福的事情。”^①

“極其幸福的事情”还在於：馬凌諾斯基（奥属波蘭人，服务於英國，他由1914年被拘留於特罗布里安羣島的“文职战俘”——躍而变成了英國殖民官吏和民族学家的教师）善於將民族学用来適應於殖民当局的需要，而提出了四个基本的、實質上並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也不是怎么太新鮮的、可是对殖民地的“主人”却是非常有益的“理論”原理：

一、不要去研究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歷史，因为他們根本就沒有歷史，即使是有的話，反正也是不可理解的；

二、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这是由社会上各个个体的生理（通过心理）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和風俗習慣之功能的总合；

三、因此每个殖民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都是某种平衡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不能加以破坏、也不需要加以破坏的，因为通过当地的首領与傳統的社会制度和習俗來管理“土人”要比較容易得多；需要的只是弄清楚这些習俗和制度的功能，然后將它們用来為自己服务；

四、因为灌輸欧洲文明（例如：学校教育超过了便於“白人”利用“黑人”劳动力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就会破坏这种平衡，所以应当使落后民族永远處於落后狀況——这样的管理就可以便宜得多，而且也放心得多！

上面所提到的馬凌諾斯基的美國追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

① E. D. Chapple and C. S. Coon, Principles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1944 p. 4. 为了避免混亂，我們在所有的地方（除了書名和文章的標題而外）都將把英文中的“Anthropology”一詞改譯為“民族学”。

战打得正緊張的时候，則提出了進一步利用自己英國老师“应用人类学”的“肯定經驗”——不僅把功能学派的“理論”和实践用之於殖民地民族，而且也用來对付欧洲人和美國人，他說：“進一步擴大活动的范围，就要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凡是適用於野人的，也將同样適用於我們自己的社会。”^①兩位作者一致認為在這方面作出了特別功績的要算華涅尔教授，因为他曾將自己在北部澳大利亞人中間工作的經驗“同样成功地、而且是更加有益地”運用於研究欧美社会。正是他在把民族学方法应用於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方面給予了主要的影響，哈尔瓦德行政事务学校的教授列斯利士柏格爾和西方电气公司的狄克遜在他們合寫的“管理与工人”一書中对此方法作了很好的叙述。

这样一來，殖民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則被“更加有益地”搬到对資本主义企業工人的管理上來了。

(三)

侵略成性的帝國主义展开了一个思想“运动”，其特点就是一方面要大量出書，一方面思想和創造性又日益貧乏。甚至連仇恨人类的謠言，希特勒分子自己也無能制造，而要跑到十九世紀前期和中叶最反动的民族主义著作的垃圾堆里去尋找自己的主要“思想”^②。

德國种族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中叶美國奴隸主思想家那里借來的，是从十九世紀前半紀德國民族主义哲学家那里和法國封建地主反动思想家戈比諾伯爵那

① 同上，第5頁。

②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拙著“种族主义和文化圈理論”。載“种族科学和种族主义”文集。“國立莫斯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著作集”第4集，1938年版，第137—170頁。

里借來的。

最新的美國反动派在自己的种族主义理論方面也很少有什么独创的东西。如果談到民族学这一領域中的种族主义表現，可以認為現代美國种族主义民族学家的主要老师，首先是納粹主义的解罪神甫之一、德國反动哲学家、“西方之沒落”这本轟动一时的著作的作者奧斯渥特·施本格勒和反动的奧地利心理学家齐格蒙德·弗洛伊德；其次，还有同样反动的英國殖民主义民族学的代表人物——英、奧、波三重國籍的民族学家布朗尼斯罗·馬凌諾斯基^①；还有納粹主义的直接思想战友、“消除生殖机能”思想的倡導者、反动伪科学“优生学”的創始人、英國的黑帮分子高尔顿和皮尔遜；至於他們直接从德國种族主义的武庫中、而后从美國自己的“民族”遺產（十九世紀前半紀黑人奴役者的創造）中大肆搬用的东西，就更不用去談了。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美國哲学实用主义和心理学“行为主义”的“民族”調味料，便做出了一鍋臭气熏天的大雜烩，就象莎士比亞在描寫女巫做菜时所說的那种情形一样：

圍著煮鍋急急忙忙地走！

快把毒心乱肺往里投，

.....

沼澤里的火蛇一条肉，

在鍋里連煮帶燒烤个透；

蜥蜴的眼珠，青蛙的脚趾，

① 參看Д·А·奧利迭罗格和И·И·波切兴：“为英帝國主义服务的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以及拙著“民族学中的蘇維埃学派”（譯文載“蘇維埃民族学的發展”，科学出版社版，第1—30頁）。

蝙蝠的黑毛，惡狗的舌头，
毒蛇嘴里的細叉，毛虫的刺，
貓头鷹的翅膀，壁虎的腿，
煮啊，煮一鍋災禍叫人人都遭殃，
煮啊，煮成地獄里的一鍋湯。

.....

使勁地煮啊，使勁地攪！
火头冒啊，冒它滿滿一鍋子泡。

（“馬克白斯”，第4幕第1場）①

在反击德國法西斯主义（它的思想基礎——生物种族主义，已在廣大居民階層的心目中遭到破產）的战争剛剛結束不久的今天，要想毫無掩飾地重新运用种族理論來作思想武器，就不是那么簡單了。誠然，为了“用於內部”，考慮到美國当地“盛行的”种族主义傳統，至少在一部分美國“白人”中間，生物种族主义还是可以受到歡迎的②。

但是，作为“出口”，这种貨色就顯然不大合適了；而且，就是在美國本土，廣大的人民羣众和進步的知識分子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傾銷市場。所以，美國种族主义的基本趋向便与“美國生活方式”的思想、与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优越”的思想、与“西方文明”的思想联系起來了。施本格勒關於“文化模式”的觀念，以及弗洛伊德關於每种“模式”有其“行为”类型的行为主义論断，乃是这些思想的“理論基礎”。在这些东西的掩飾之下，同时还动用

① 参看：莎士比亚：“馬克白斯”，新文藝出版社版，第59—60頁。

② 参看：М·Г·列文、Я·Я·罗金斯基、Н·Н·切波克羅夫合寫“英美种族主义”和 Л·Н·莫查林“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理論”（原文載“哲学問題”1948年第2期）。

了馬尔薩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露骨的种族主义思想。

(四)

大家知道，奧斯渥特·施本格勒是德國反动民族学家列奧·弗罗伯尼烏斯的学生和同僚，但他比起自己的老师倒要“聞名”得多，他在自己所著“西方之沒落”一書中提出了“文化”好象是一种活的有机体的思想。它們好象也經歷着“胚胎时期”、“幼年时期”、“成年时期”和“老年时期”（逐漸成長为“文明”），它們也在“生長”和“死亡”，它們也象唯心主义者对生物有机体的看法一样而具有决定文化个性的“灵魂”（弗罗伯尼烏斯用希臘字給这种灵魂起了一个學術名称——叫做“派德烏瑪”）^①。

施本格勒探溯了三种“文化”的歷史，这三种“文化”——即东方文化，他們称之为“阿拉伯文化”，附着的是“巫術灵魂”；古典文化，附着的是“阿波罗灵魂”；西方文化，附着的是“浮士德灵魂”。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独自存在的和不可重复的。如果說“阿拉伯文化”和“古典文化”很早就已沒落，就已不在人世間了的話，那么，照施本格勒看來，“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在十九世紀还只是進入“文明”的第一階段，在它的面前尚有“兩個文明階段”，歷时將不止一百年。不过，为此却需要……德國人的世界統治。法國人和英國人，这些“浮士德灵魂”的低能体现者，已被施本格勒宣判死刑。他們的創造力已經枯竭，他們的文化已經完成了自己發展的一个輪迴。至於德國人，則是另一回事：他們的毀滅还“在遙远未來的迷蒙之中”。同时，施本格勒惡毒地詆毀馬克思主义，好象馬克思主义与“德意志精神”是絕對不能相容的，

^① 參看拙著“种族主义和文化圈理論”一文。

妨碍了“浮士德灵魂”之伟大远景的实现。他大力宣传“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中已经显露了后来已遭可耻失败的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国家”的雏形。

虽然施本格勒有时也十分尖锐地批评黑格尔，但是，就是在这些伪科学的神密的翻言背后也不难看出他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基本环节相联系的蛛丝马迹。照这种“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宇宙精神”是在自东而西的道路上“漫游”于“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德意志世界”的。而在后一个世界，世界历史则达到了“普遍性和主观自由”，这只是在……普鲁士王朝才可以实现的。但是，在施本格勒那里，黑格尔显得比他本来更加反动，因为施本格勒的观点完全摒棄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有力的方面——即普遍联系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统一过程的思想。施本格勒的“文化”和“灵魂”都是孤立自在的。施本格勒的“文化灵魂”乃是德国种族主义者所谓“种族灵魂”的直接雏形，正象施本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就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雏形一样。

美国民族学中施本格勒学派的奠基者，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研究“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女学者、鲍亚士的学生——路丝·别涅迪克特，她在1934年就发表了她那轰动一时的大著“文化模式”，书中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根据民族学的材料审查和论证施本格勒的“理论”。他写道：“从民族学方面来说，施本格勒的世界文明图景就是苦于需要……解释最新的社会分裂的社会好像具有同一的民族文化。要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下进行必要的分析，西欧文化的历史材料就嫌过于复杂，社会分化也过于荒远……我们之所以要对原始民族进行研究的哲学根据之一，就是比较简单的文化事实可以使得那些已变得纷乱

而难以說明的社会事实顯得比較清楚……至於个体行为模式在傳統習俗影响下如何形成的問題，現在最好也能通过对比較簡單的民族的研究提了出來。”^①

这种錯誤的反歷史的为資產階級民族学和社会学普遍持有的观点，这种認為在原始社会就以“比較簡單的”形式存在着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切現象而其間只有量的差異的观点，这种早已为列寧在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战中所及时駁斥了的观点^②，近來，倒象一根紅綫一样地貫穿着美國时髦民族学的著作，差不多已成为他們的基本准則。果然就是如此，別涅迪克特馬上就开始“尋找”好象符合於施本格勒“分类”的“阿波罗灵魂”和“道尼苏斯灵魂”的类型（或用她的話來說，即“文化模式”），其实，發明这种名辞的“榮譽”应当屬於种族主义的“經典作家”、十九世紀最反动的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尼采（“阿波罗灵魂”一語他早已造出，施本格勒只是加以傳播而已）。

楚尼人（“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好像就是“阿波罗文化”的例子^③，不过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主要的还是“道尼苏斯类型”，这种类型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④，以及別涅迪克特所特別描述过的西北海岸的瓜基烏特人^⑤。除了这两种类型而外，她在安特卡斯托羣島的多布島和新几內亞东南的巴布亞人中間又“發現了”一种类型。別涅迪克特對於多布人的描述，主要是根据“多布人的巫师”^⑥一書的虛浮

① 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a. New York, 1934, p. 55.

② 參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4頁。

③ 參看別涅迪克特上述著作第80、234頁。

④ 同上，第80頁。

⑤ 同上，第175、177等頁。

⑥ R. F. Fortune. The Sorcerers of Dobu. New York, 1932.

作者福尔秋的材料；她所作的描述，乃是对於一个弱小的、在殖民压迫之下过着贫苦生活的、遭受着“黑鳥獵捕者”^①殘酷剝削的、从事鋤掘農業的勤勞民族進行惡毒誣蔑的典型例子。多布人的民族性格，竟然被描寫成这个样子：好像他們“極端仇視（全世界的人們）和十分凶惡；大多数社会都是用自己的社会机关使其局限於最小限度，可是，多布人的机关恰恰相反，倒是使其达到最高的程度，多布人生活在宇宙惡意安排的人类夢魘的压力之下，照他們對於生活的观点看來，人們的善行就在於挑選犧牲，由於犧牲可以宣洩出他們對於人类社会和自然勢力的怨恨……多疑和殘忍——這是他們在斗争中久經鍛煉的武器，他們从不憐憫別人，也从不要求憐憫”。^②

这种可惡的誹謗距离实际情况是那样远，我們哪怕就是根据偉大的俄國學者、十九世紀的民族學家米克路霍—馬克萊這位真正客觀的觀察者對於馬克萊海岸巴布亞人所作的完全相反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無論是在人種方面、文化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這些巴布亞人都沒有什麼與多布人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僅僅認識一個歐洲人——這個人是米克路霍—馬克萊，而不是海盜，也不是傳教師。這種對於整個民族的惡毒歪曲，乃是對於施本格勒所謂“東方巫術靈魂”之謠言的一種特別的折射反映，它成為無休止地談論什麼種族主義心理性格的材料（例如，多布人以及“道尼蘇斯”瓜基烏特人被宣布成為“侵略病狂

① 在大洋洲殖民主義者那里，“Blackbirding”（“獵捕黑鳥”——是一句黑話，意即“誘拐黑奴”）這個“美妙”的名詞，是用來表示“征募”美拉尼西亞人到昆士蘭種植場去從事半奴隸勞動。參看：卡托列夫，“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現代狀況的研究”，載“蘇聯民族學研究所簡報”1949年第7期第19頁。

② 參看別涅迪克特上述著作，第172頁。

者”）^①。路絲·別涅迪克特在麥克阿瑟總部工作，她根據戰略服務處的任务對日本人的思維和“行為”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於1946年發表了一本著作，並給它起了一個富有詩意的書名——“菊與劍”^②。她在这本誣蔑性的著作里斷言，日本人的內部世界完全不是由意識調節的。

這樣，在美國民族學的發展上便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即開始形成施本格勒—弗洛伊德理論體系，它們將世界各族變成神經病患者的大集會，變成某種規模巨大的瘋人院，這自然需要“精神病學家”來照看了。這個角色已經派定，當然是屬於“優秀文化模式”的代表者，屬於美國帝國主義者，路絲·別涅迪克特及其追隨者正殷勤地用“民族精神病學”的教科書給他們以武裝——像科拉·杜布哇、拉里夫·林頓、阿布蘭·卡爾迪涅爾、格列哥里·巴蒂遜等等作者的一套“著作”，真是難以名之，姑且叫它“民族精神病學”。

凡是在路絲·別涅迪克特“文化模式”一書中所出現的東西，在這里都獲得了種族主義惡毒謠言的完備特征，不僅對多布人、而且對其他數十個被宣布為心理不完善的民族進行可恥的誹謗。路絲·別涅迪克特完全同意施本格勒的觀點，也認為一種“文化模式”的代表不能了解另一種“模式”的代表。這些模式都是“不能互相了解的”^③。大草原“道尼蘇斯”印第安人認為很自然的東西，在“阿波羅”楚尼人看來則是失常的表現，反之亦然。一個多布人如果按照美國人所謂“好小伙子”的觀念來做，那末，從自己“巫術的”同族人的觀點看來，則是一個危險的瘋子^④。在

① 同上，第238頁。

② R.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Cambridge, 1946.

③ 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p. 223.

④ 同上，第258頁。